

中美权力转移与亚洲地区体系^{*}

马荣久

内容提要：地区体系不仅是支撑全球霸权的组成部分，也是崛起中的大国权力与地位得以巩固和提升的重要根基；地区体系不仅是国家实力、尤其是大国实力分配的场所，而且还是塑造国家之间态度、观念和身份特征的“熔炉”。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区体系是决定权力转移的动力与结果、形态与特征的最为关键的层次。中美权力转移的进程——无论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还是美国的“重返亚洲”——显示出地区体系对于大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身份定位和政策选择的深刻塑造。中美权力转移的和平前景，不仅取决于两个大国的双边关系和外交政策，而且蕴涵于亚洲地区体系的发展进程之中。只有一个保持了“主体性”的亚洲地区，以及在该地区建立更可持续和更具建设性的地区秩序架构和地区制度安排，才能够真正发挥缓解权力转移困境、进而增加全球体系和中美大国关系稳定性的作用。

关键词：权力转移 和平崛起 “重返亚洲” 地区体系

作者简介：马荣久，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一、引言

在以国际权力结构和国家行为体作为分析单位的知识谱系中，大国之间的安全和政治关系通常被认为主要是由这些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权力地位

* 本文系 201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期我国的国家安全与周边地区战略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010GJ001）和 2012 年度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中国与地区政治”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当代亚太》杂志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评审意见和修改建议。

《当代亚太》2014 年第 1 期，第 21~34 页。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Bimonthly)

所决定，而体系的结构变换和国家的等级排列在持续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此过程中，现有的主导性大国总是竭力运用其所拥有的绝对或相对实力来维护自身体系领导者的地位以及相应的利益配置，试图防止出现对自己地位的任何挑战，并会作出“预防性战争”、“遏制”、“约束”或者“接触”等政策选择以应对新兴大国的崛起。^①与此同时，崛起中的大国由于经济和政治变化速度的不均衡而获得了更大的相对实力，这种物质实力的变化会使崛起中的大国能够在全球及地区政治秩序中寻求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寻求体系和秩序的变化以反映其权力与期望，以及寻求与其力量相称的更大的安全和利益。

因此，所谓的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是一种“由于世界政治中国家实力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所发生的原有的主导性大国地位下降、后崛起的大国地位上升，并获得主导性大国地位的权力变化过程”。^②权力转移通常被认为是导致国际关系中出现不稳定因素、甚至大国之间发生冲突与战争的最主要诱因之一。有鉴于此，学界对于权力转移的条件和前景问题表现出了持续的研究旨趣。在相关的分析中，大国间力量变化的趋势——如“权力持平”（power parity），崛起中的大国对于现行国际秩序的态度——“满意”还是“不满意”，^③以及“国际体系中的利益分配能否及时适应权力分配的变化”等，^④被认为是影响“国际秩序的转变是以和平方式还是以暴力方式完成”的关键因素。

本文认为，无论是理解大国之间权力的变迁还是态度的转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权力转移的性质，仅以单一的全球体系层次作为分析背景，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存在明显的局限。这不仅是因为全球体系涵盖了不同的地区体系，^⑤而

① Randall L. Schweller, “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1-32.

②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Chapter 1.

③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朱锋:《“权力转移”理论:霸权性现实主义?》,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24~42页。

④ Steve Chan, “Exploring Puzzles in Power-Transition Theory: Implications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ecurity Studies*, Vol. 13, No. 3, 2004, p. 112.

⑤ 道格拉斯·莱姆基 (Douglas Lemke) 将权力转移理论从单一全球体系的情形延伸至全球体系内存在多个地区体系的情形。他认为,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不仅适用于全球体系内大国之间的互动,也适用于地区体系内有关国家之间的互动。参见 Douglas Lemke, *Regions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且在全球体系以及具有某种从属地位的地区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相互转化的可能。因此，理解权力转移的动力和结果同样需要融入地区体系的分析层次。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在没有首先明确某一体系的地缘范围和权力基础的情况下，任何试图探讨国际体系的主导、权力的分配或者权力的转移，都不是特别有意义”，“若要过去或将来大国政治的战略动态作一个全面理解，需要在理论上融合（地区和全球）两种体系分析层次”。^①

中美权力转移及其对亚洲地区体系变化和地区秩序前景的影响已成为目前学术界关注的一大焦点。在已有研究中，学者强调了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以及大国之间的战略应对和互动，指出了亚洲地区逐渐明晰的经济中心和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② 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中美权力转移与地区体系的内在联系，论述的重点是在中美权力转移过程中，在地区与大国相互塑造的背景下，亚洲地区体系“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本文以中国的和平崛起和美国的“重返亚洲”作为案例，力求在兼顾并且整合地区与全球两个层次互动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权力转移的动力、进程和发展方向。

二、中国和平崛起：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地区体系

有学者指出，权力转移对于中国或东亚而言都不是什么新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外交史和东亚国际关系史就是一部中国多次崛起的历史。^③ 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在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和地区秩序下，在“霸权国—崛起国”矛盾尚未显著激化的过程中，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了实力和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并且通过国内发展与合作外交，以和平方式推动了地区秩序的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两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早已开始，

^① Jack S. Levy,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 Robert S. Ross and Zhu Feng, eds.,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1, 23.

^② 参见吴心伯等：《转型中的亚太地区秩序》，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第6～34页；David L.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③ 罗伯特·罗斯：《中国崛起、地区权力转移与东亚安全：从1949年到21世纪》，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第36页。

而权力转移的“和平”性质则是基于地区体系与大国的身份和地位相互积极塑造的“过程导向”的结果。

（一）实力提升与利益共享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以社会主义阵营一员的身份加入到全球冷战对峙中，因此，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非敌即友”的“冷战思维”不可避免地会在中国的地区观念以及周边关系中留下深刻烙印。中国与周边地区国家间的关系受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相互关系的极大影响，实际上，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本身就是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关系的最重要内容。“可以说，长期以来，中国不是从地区（region）角度出发处理与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关系，而是在双边层次上处理与各国间的关系。”^①因此，中国一度被认为是“没有地区政策的地区性大国”，“没有亚洲政策的亚洲大国”。^②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亚洲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地区内国家政治独立性的明显增强，尤其是随后中国自身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对和平稳定的周边地区环境的实际需要，重塑了中国与地区互动关系的核心内容，以及包括作为原有的主导性大国——美国——在内的有关各方的角色定位。

经贸领域是中国与地区国家互动的重心。一方面，中国积极融入国际和地区体系，积极与地区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地区经济影响力迅速提升。其结果，中国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心和最主要的引擎，并与地区内许多国家建立了深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国现已成为周边11个国家以及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7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③另一方面，几乎每一个亚太地区国家都在采取务实外交政策，调整自己和中国的关系，把中国的经济崛起视为一个机会，并从中国经济实力上升的过程中获取经济利益，以推动本国经济的繁荣发展。

对于中美关系而言，由于中国的实力上升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美国倾

^① Rosemary Foot, “Pacific Asia: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Dialogue”, in Lou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39.

^② Steven I. Levine, “China in Asia: The PRC as a Regional Power”, in Harry Harding,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07-114; Samuel S. Kim, *China In and Out of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84.

^③ 乐玉成：《世界大变局中的中国外交》，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1~6页。

向于接纳权力转移过程中中国的角色。一方面，在经济领域，中美存在比较大的利益交集，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能为美国创造可观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并未对美国构成较大的安全威胁，“因此，虽然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是一件不令其感到舒服的事情，但这在较长时期内并未对美国的利益构成重大威胁，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也未形成很大冲击”。^①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能够以包容和建设性的方式应对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利益诉求，并促进了中国的和平崛起。

（二）互动进程与行为调适

正是在与地区内国家密切互动的基础上，中国逐渐明确了以稳定、发展、参与、合作为核心的地区观念，以及自身作为地区内其他成员的“朋友和伙伴”、而非“盟友或敌人”的身份定位。中国本身的外交行为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例如，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由相对超脱转向积极参与，从恪守国家主权和双边主义转向发展多边主义，在自身能力增强的同时也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外交日趋重视将追求本国的利益与维护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共同利益相结合”，“中国的发展日益与亚洲的振兴联系在一起”。^②中国同亚洲不同国家和次地区的关系在新的基础上正在出现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相互塑造。与此同时，中国从未试图把美国的力量挤出亚洲。恰恰相反，中国一直在调整自己以接受美国在亚洲的存在，甚至是其在该地区的领导者地位。中美对于各自在亚洲地区和次地区的角色定位形成了较为一致的预期，愿意接受对方在地区秩序中的地位和行为方式，这显然有助于权力的和平转移。

东北亚是一个邻国之间关系相对紧张的政治互动舞台，在此开展机制化合作一直十分困难。作为这一地区关键的地缘战略角色，中国不仅充分参与东北亚事务，而且积极倡导为塑造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进行建设性合作。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谋求半岛无核化方面，中国的国家身份发生了深刻变化，日益扮演起“负责任大国”的角色，^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这“使得曾经一直是这一地区安全产品主要提供者的美国调整了自身在这一

^①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13页。

^② 王毅：《亚洲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1期，第59页。

^③ Hochul Lee, “China i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es: ‘Interest’ and ‘Identity’ in Foreign Behavi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2, No. 80, 2013, pp. 312-331.

地区中的定位，承认了中国在接洽朝韩之间的有效性和在东北亚谈判体系中的独特地位”。^①与此同时，地区内有关各方“开始包容中国的利益关切”，如“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及其相对于中国军事力量不断增长的脆弱性，要求其重新评估自己与美国战略结盟的安全利益，并逐渐适应中国的安全利益”。^②因此，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的，“由于台湾地区和韩国和平适应中国大陆的崛起并未对美国在抵制使用武力方面的信誉构成挑战，美国因此能够默认中国的崛起，并减少其在中国周边地区和东亚大陆的战略存在”。^③

在东南亚，中国不断调整外交政策以适应变化的地区形势，在感到足够安全和自信的情况下，以一种务实的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身份来行事。^④中国始终支持东盟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努力；在政治上承认东盟国家的领导地位，而不是与美国竞争所谓的“领导权”。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支持东盟国家不断扩展的多边外交，确保兑现对其做出的互惠和建立战略稳定关系的承诺，以消除有些国家对于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所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的疑虑。与此同时，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存在以及中美总体关系的改善，共同维护了支撑地区互动的战略稳定。在地区秩序的构建中，东盟各国并不是被动地“搭便车”或者被迫地“选边站”，而是作为“政治上的调解人”（political middlemen），努力发挥自身的作用和影响，并且通过建立地区多边机制和合作网络，来规范大国之间互动的进程和方向。^⑤在这种互动的框架下，中美之间的大国权力对比及其变化不再是地区秩序构建中的唯一主导因素。中美和东盟三方的折冲樽俎和相互影响决定着东南亚地区秩序的结构和走向，最终保证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⑥

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中亚地区，中国积极推动“上海五国”合作机制发展

① 罗丝玛丽·福特：《中国与亚太的安全秩序：“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0页。

② Robert S. Ross,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3, 2006, p. 381, 392.

③ 罗伯特·罗斯：《中国崛起、地区权力转移与东亚安全：从1949年到21世纪》，第41页。

④ Wang Gungwu,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Context of a New Beginning”, in David L.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pp. 187-204.

⑤ Evelyn Goh,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3, 2007/2008, pp. 113-157.

⑥ 刘阿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东南亚地区秩序——美国、中国与东南亚的角色》，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6期，第43页。

为“上海合作组织”，使之成为确保次地区稳定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和支撑。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积极扮演“议程设置者”的角色，塑造和决定了该组织其他成员国的迫切需要和政策议程，明显影响了地区安全观念。^① 由于中国的中亚政策着眼于地区稳定和共同发展，而非“排他性”的大国竞争、主导或者控制，因此，它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地区外大国在诸多领域存在合作外交的机遇。

如果说“和平崛起意味着一个正在成长的大国在物质和身份地位，以及与国际体系中其他大国的关系上均有能力获得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崛起国自身适应国际社会的规则与结构，不会与邻国或其他主要大国引发严重敌对；与此同时，其他大国包容这些规则和结构中的变化以适应新的权力与身份分布状况”；^②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的“崛起”显然是“和平”的，它同时意味着“权力的和平转移”与地区秩序的平稳演化。一方面，随着总体实力以及相应的提供地区公共产品能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正日益成为影响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协调与合作以及制度与规范构建的关键因素，并由此塑造着地区内国家的战略规划、政策反应和互动方式，同时带动整个亚洲地区在全球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就中美大国关系而言，尽管权力转移经常伴随着不稳定，但地区体系与大国身份和地位的相互塑造，不仅推动了崛起中的中国在物质与观念上的成长，而且促进了主导性大国美国和中国以相互调适为主要特征的良性互动以及它们之间战略关系的基本稳定。

三、美国“重返亚洲”：权力转移背景下的地区体系

在美国战略界看来，“亚洲重返世界事务中心是 21 世纪重大的权力转移……但是，美国没有盯住那个地区，反而将本世纪头十年浪费在伊拉克和阿

^① Nadine Godehartdt, “China and the Definition of the Asia Region”, in Nadine Godehartdt and Dirk Nabers, eds., *Regional Powers and Regional Orde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129.

^② Barry Buza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2010, p. 5.

□ 当代亚太

富汗两场战争上面”。^① 因此，为继续维持单极体系下的主导地位，防止出现对自身地位的任何挑战，美国将全球经济、安全和战略的重心转移至亚洲。

2009年执政伊始，奥巴马就宣称自己是美国的“第一位太平洋总统”，试图对其前任小布什政府不重视亚洲的做法进行“纠偏”。2010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重返亚洲”战略，即大幅增加对亚洲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投入以及军力投放，意欲在地区事务中扮演长期的主导角色，以便按照美国的意图重塑亚洲地区的未来格局。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制定基于以下假设：亚洲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驱动力，未来的政治格局将取决于亚洲，而不是阿富汗或伊拉克；美国将置身于行动的中心。^② 与此同时，美国将不会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对其示弱，坐视中国在亚洲的“势力扩张”；因为“一个新近强势的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利益，破坏着地区稳定，而中国之所以这么做纯粹是因为它有这个实力——日益增强的军力使得强硬外交比过去更容易和更具吸引力”。^③

从权力转移的角度来看，国际秩序中现有的主导性大国着眼于防范和遏制崛起大国的目标定位而采取的战略选择，具有深刻的地区层次的涵义，并且产生了明显的后果。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名义上是为了“威慑”中国的崛起对亚洲既有秩序可能产生的“威胁”，从而维持亚洲秩序，但结果却恰好相反。美国宣布“重返亚洲”不久，亚洲秩序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并且不是变得更稳定了，而是呈现出失序的趋势。^④

1. 美国“重返亚洲”正在改变该地区国家间互动关系的核心内容，强化了相关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以及具有显著“排他性”特征的地区主导权之争。

作为单极体系下的主导性大国，尤其是影响力在当今世界不同地区体系的广泛存在，美国拥有基于其目标与环境的需要而改变某一特定地区互动形

^① 约瑟夫·奈：《奥巴马转向太平洋》，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2011年12月7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x/2011-12/08/content_14231826.htm。

^②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Vol. 189, No. 6, November 2011, pp. 57-63.

^③ Robert S. Ross, “The Problem with the Pivot: Obama’s New Asia Policy is Unnecessary and Counterprodu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12, pp. 70-82.

^④ 郑永年：《美国“重返亚洲”与亚洲秩序的巨变》，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2012年9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9/24/c_123750842.htm。

态的力量优势和战略选择。^① 美国“重返亚洲”显然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基础，旨在加强与亚洲国家的防务关系、扩大自身军事力量在亚洲的长期存在，并力图通过一系列双边同盟和伙伴关系，在该地区推行所谓的“战略再平衡”（strategic rebalance）。在此背景下，“美已大幅提升‘制衡中国’的地缘政治范围，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的以前沿驻军和军事同盟为基础的对华军事能力和台湾问题的防范与制衡，扩大至整个亚太范围、以战略节点地区为重点的对华地缘战略影响力的防范与制衡”。^② 这意味着美国在亚太地区引入并强化了安全和军事领域的战略竞争，而转变和淡化了一直以来推动地区共同利益成长的经济和贸易领域的互动。历史经验表明，经济领域的互动更多是良性的，而战略上的竞争则往往是“零和博弈”。

在巩固安全领域优势的前提下，美国“重返亚洲”后努力在经济领域采取主动，力图重新占据地区经济合作的中心位置，从而保障美国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大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通过推进 TPP，美国一方面可以避免自身被排除在地区合作进程之外，借此获取地区经济规则的制定权，以主导地区经济合作的路径和方向；另一方面，可以在经济合作的进程中对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孤立，至少可以从制度和规则等层面消解中国在地区经济领域的影响力。^③ 如果美国主导下的地区经济安排继续打上“排他性”的烙印，那么从长期来看，亚太地区国家最终需要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太平洋经济体系和以中国为推手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之间做出选择。

2. 美国“重返亚洲”改变甚至中断了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在地区互动各领域的互相调适以及相互塑造的进程。

在美国高调宣布并实施其“重返亚洲”的新战略之前，中国和亚洲各国在经贸、安全以及地区性制度框架等领域的互动一直处于一个相互调适的进程。对于错综复杂的亚洲地区和形塑中的地区秩序而言，地区内国家的互动进程意义重大。正如有关研究指出的，行为体进入互动进程之前，可能是出

^① Jeffrey W. Legro, “The Omnipow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gional Orders”, in Nadine Godehardt and Dirk Nabers, eds., *Regional Powers and Regional Orders*, pp. 175-192.

^② 朱锋：《奥巴马政府“转身亚洲”战略与中美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4期，第7页。

^③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第19~20页。

于利益权衡，但一旦进入进程之中，就在整合与被整合；进程的维持意味着观念、规则和认同被持续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也意味着这些被建构的规范、规则和认同对进程的维持起到了促进作用。如果通往目标的进程充满动力并得以维持和加强，它最终将会自然而然地导向预期的结果。因此，维持进程本身与通过互动的进程获得结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①

在南海争端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在没有明显的外部干扰因素的情况下，地区内国家的相互调适和相互塑造，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正是在互动的进程中，中国与地区内各国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赖日益拓展和深化，双方逐渐学会利用各种过程和机制来提升互信、加强外交合作。中国加入东盟地区论坛（ARF）、《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以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的签署等标志着互动成果的产生；而在互动进程中，亚洲地区的其他国家并没有在中美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也不是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它们也在积极塑造和适应中国的安全理念和行为取向。可以说，有关国家在互动进程中的互相调适以及相互塑造，成功地降低了潜在冲突发生的可能。

在上述事态的发展进程中，美国几届政府曾经一再强调在南海没有主权和领土诉求，在南海争端问题上不持立场、也不选边，总体上维持了“不偏不倚”的状态。然而，在“重返亚洲”的战略背景下，奥巴马政府使美国直接卷入了这场复杂的争端中。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声称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牵涉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并把帮助加快多边协商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优先”。^②正是由于美国的高调介入、拉拢和挑拨，使南海问题更趋复杂，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与中国存在领海/领土纠纷的国家对华立场变得强硬。很显然，这些国家也趋向于迫使中国中断继续向这些国家调适的努力。尽管中国的选择到目前为止还是防御型的，但足以阻碍中国和这些国家关系的发展

^① 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大国的社会化——东亚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崛起》，载朱锋、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262页；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86页。

^②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2010年7月越南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的正式发言、双边会谈和公开声明中都做出过这一表态。参见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at Press Availability”, Hanoi, Vietnam, July 23, 2010,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7/145095.htm>; Cara Anna, “Clinton Claims US Interest in Resolving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http://www.foxnews.com/world/2010/07/23/clinton-claims-national-resolving-south-china-sea-disputes/>.

和深化。^① 由此而言，美国利用地区存在的纷争以推进“重返亚洲”、平衡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战略，以及作为一个外来的全球力量对亚洲地区事务的强势渗透，无疑会改变甚至中断地区内国家相互调适和塑造的政治意愿和积极进程。而一个缺失了“进程”动力的地区体系，将为权力的结构性影响或者大国之间的权力博弈提供更大空间。

3. 美国“重返亚洲”削弱了亚洲地区的主体性及其对于地区国家间行为和 大国关系的塑造能力。

近代以来，亚洲地区秩序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外部力量占支配地位，其大背景是西方的崛起及其对国际体系的主导。冷战期间，亚洲地区尚缺乏自身完善的秩序体系，只存在被称之为美国支配下的“轴辐”（hubs and spokes）体系；这样一种地区体系的存在，显示出该地区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秩序的“缺席”和“共享”的“缺失”。^② 在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推动下，亚洲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亚洲在国际体系中的分量不断上升。“与这一过程同时发生的就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崛起以及本地区国家相互关系的加强，这意味着亚洲重新获得其‘主体性’，地区秩序正在回归正常。”^③

亚洲的主体性已经显示出该地区与融入其中的国家处于积极的相互塑造的进程之中。亚洲地区作为国际事务发生和国际关系运作的重要平台，不仅能够成为一些国家实施发展战略、发挥国际作用和提升国际形象的重要依托，而且有关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相对地位与作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以往在世界政治中作用不大的中小国家，现在很可能成为地区内的重要角色，获得超越其国力“大小”的发言权和国际影响力。亚洲的主体性还体现为，地区利益的存在、地区合作与认同的增进以及地区制度和规范的发展，不断塑造着有关国家的自身定位和政策选择，塑造着地区内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互动模式。与此同时，地区事务的管理与安排不再完全受大国的控制或者从属于全球政治力量均衡的要求，而是主要以地区内国家的利益以及它们对地区稳定、秩序与更好地应对全球竞争和挑战的需要为基础。正如有学者所指

① 郑永年：《美国“重返亚洲”与亚洲秩序的巨变》。

② 罗丝玛丽·福特：《中国与亚太的安全秩序：“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第8~15页。

③ 吴心伯：《美国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的反应》，载《美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1期，第53页。

□ 当代亚太

出的，“亚洲越来越能够处理好它所面对的安全挑战，这得益于共享的地区规范、日益提升的经济相互依存以及不断发展的制度联系”。^①

美国“重返亚洲”显示出一个外来的全球性力量为维持其霸权地位而加紧渗透到一个地区的事务中，甚至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覆盖”(overlay)。^②显然，“美国有能力充当一种霸权、介入一些地区但又不与它们其中任何一个有长期联系，而且大体上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来改变介入的程度和特征，它的超级大国身份便是在这些当中得到表达的”。^③美国试图通过“重返亚洲”谋求在地区安全、经济、行为规则和规范等领域“排他性”的主导权，并为此目标而竭力维持地区内一部分国家对美国的战略信心和同盟依赖，甚至在一定范围内挑动地区内的安全问题、挑拨地区国家间业已存在的矛盾与纷争，从而达到牵制和制衡崛起国的目的。在此背景下，一部分地区国家“选边站”或者“脚踏两只船”的倾向明显增强；与此同时，地区内其他国家、尤其是崛起中的地区大国进行战略与政策选择的空間变小，成本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重返亚洲”不是推动本地区在安全与经济等若干领域的协调发展以及关乎共同利益的地区合作，而是加剧了地区的离心力，削弱了地区的主体性，阻碍了以地区内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密切互动为基础、以日益提升的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发展的制度联系为纽带的稳定演化中的地区体系和地区秩序。进一步来看，一个丧失了主体性的地区将会成为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温床，而不能发挥冲突缓冲器和地区格局塑造者的积极作用。

希拉里·克林顿曾指出：“我们（中美）两国正在尝试从事一件历史上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它将会写下新的答案，来回答一个老牌大国和一个新兴大国相遇时将会发生什么的问题。”^④然而，美国“重返亚洲”的本质——维护支撑“霸权”的地区体系和秩序、寻求对己单方面有利的结果，或许排

^① Amitav Acharya,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2003, p. 150.

^② “覆盖”意味着外在国家的利益超越纯粹的渗透，并开始严重主导一个地区，以至于整个地区的安全相互依赖的本地脉动事实上不再发挥作用。它通常导致大国武装力量在该地区长期驻扎，以及本地国家根据大国对抗的模式而结盟。参见巴瑞·布赞、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3页。

^③ 巴瑞·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

^④ Harry Kazianis, “Established Power vs. Rising Power”, *The Diplomat*, September 5, 2012, <http://thediplomat.com/the-editor/2012/09/05/established-power-vs-rising-power/>.

除了其所寻求的那种建设性关系的可能。

四、结 语

在本文看来，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最终将会影响全球层面上的格局与秩序，而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权力转移始终需要地区体系作为一个坚实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区体系是决定权力转移的动力与结果、形态与特征的最为关键的层次。

其一，地区体系不仅是支撑全球霸权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崛起中的大国权力与地位巩固和提升的重要根基，由此塑造了权力转移的动力和支点。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地区的事务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①从战略的角度来说，全球性大国地位和地区大国地位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影响非常重要。免于地区纷争的纠缠无疑是通往全球大国地位的捷径；而如果因地理位置的限制而不能置身其外，那么，取得所处地区的主导权就是成为全球大国的另一条途径。^②就国际政治的现实而言，当今的美国式“霸权”完全借助于地区和地区力量的支撑，“地区体系是维持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一个关键因素”。^③中国的“和平崛起”显然得益于地区与国家的相互塑造，其未来的全球大国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有赖于此。

由于地区是诸大国利益和影响之所在，是大国权力和地位的发源地，因此，强大的国家往往会通过战略行动和自身影响力的结合将国家目标投射在国土之外，^④旨在塑造一种国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超越其国界的地区环境。由此，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大国关系和战略互动是塑造地区体系的重要力量，某种形态和特征的地区秩序自然成为大国权力和目标的重要指向以及大国战略互动的核心议题。

① 叶自成：《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几点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第10页。

② Barry Buza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p. 28.

③ 巴瑞·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第106页。

④ 阿诺德·沃尔弗斯：《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于铁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 当代亚太

其二，地区体系不仅是国家实力、尤其是大国实力分配的场所，而且还是国家之间态度、观念和身份特征的“熔炉”，由此塑造了权力转移的过程和性质。

毋庸置疑，以物质实力为指标的“权力”的转移或再分配是影响大国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因素，但它并不是决定性的，并非注定了“大国政治的悲剧”。因为“一定体系中的国家实力以及实力分配只有在该体系的社会环境里才具有含义。譬如，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含义取决于这个国家在身份上是敌人、对手还是朋友”。^①因此，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大国关系同样取决于双方如何看待对方的社会身份、尤其是身份具体特征^②的变化，并由此影响双方如何看待对方物质实力的变化。

中美权力转移的进程，已经显示出亚洲地区体系对于双方的态度、观念、身份定位和政策选择的“熔炉”作用。如果在地区与大国相互塑造的进程中，中美两国不断适应对方相对力量的快速变化并相应调整其地区战略和政策，双方“对地区格局与地区秩序的发展方向，以及各自在将要形成的地区秩序中的定位形成比较一致的预期”，^③双方的物质实力更多地转变为共同应对地区性挑战或者实现共同的战略目标所需的集体资源，那么，两国在该地区的互动无疑能够增加更多分享的利益、期望、观念以及“身份的具体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权力转移的和平前景，不仅取决于两个大国的双边关系和外交政策，而且蕴涵于地区体系的发展进程。而只有一个保持了“主体性”的亚洲地区、以及在本地区建立更可持续和更具建设性的地区秩序架构和地区制度安排，才能真正发挥缓解权力转移的困境、进而增加全球体系和中美大国关系稳定性的作用。

^① 刘永涛：《中美安全政治关系的可能走向》，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2页。

^② “如果说身份是重要的的话，那么，它所体现的方式高度依赖于起作用的身份的具体特征，而不仅仅是它们是否相似或相区别。”参见巴瑞·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第2页。

^③ 周方银：《中国与亚太地区秩序》，载吴心伯等：《转型中的亚太地区秩序》，第115页。